

张闻玉

著

古代天文历法论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

分类号	234
著者号	乙 118
登录号	33308

张闻玉

著

古代天文历法论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

考古所图书馆



Z0033308

责任编辑：方家常

整体设计：周 红

1998.3.24

三联韬奋图书中心

No. 7203737

古代天文历法论集

张闻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州新华(校办)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193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500

ISBN 7-221-03962-3/K·349 定价：22.00 元

前　　言

一九七九年秋到一九八一年春，我一直在先师张汝舟先生身边进修古代汉语，耳提面命，亲聆教诲。其间还到南京大学训诂讲习班听课。那时的主要精力还用在声韵训诂方面，尤其对黄侃大师的古音学怀着浓厚的兴趣。记得初到滁州，汝舟师刚刚写完了“历术甲子篇浅释”和“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表解”两篇文章，已由滁州师专讲授古文的郑先生帮助誊校。大概因为郑先生忙，就自然地落在我的头上。待我逐渐懂得两篇文章的重要意义，就想深入地钻研下去。一九八〇年十月，由南京大学王气中教授、南京师大徐复教授、山东大学殷孟伦教授共同发起，在滁州师专办了一期古代天文历法讲习班，主要是宣讲张汝舟先生的古天文历法观点，参加讲习班的是南大、南师大、山东大学的研究生和贵州方面汝舟师先前的弟子。汝舟师年迈体衰，不可能亲临课堂，学习的辅导就由我和一同进修的张耿光兄来承担。短短十余天的学习，大家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一致体会到汝舟师的古天文说是科学的、可信的。学习的主要材料就是汝舟师的两篇论文，似较深奥，都感到还应该有一本通俗简明的小册子才便于初学者的入门。大家便鼓动我来完成这个任务。于是就在那年底之前写了

《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浅释》。尔后在南京大学、在湖南师范大学给中文系研究生讲授，都先后作为教材印发过。

从那以后，陆陆续续就古天文历法写了不少文字，或阐释古籍中的有关记载，或考证出土文物的有关问题，大多还能得心应手，私意是想有一个较为圆满的解说。这些文章，说不上对汝舟师的古天文说有什么发展，只能讲有所应用而已。因为是科学的，自然就具有实用性，便要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些论文就是明证。立足于汝舟师的古天文说，于文于史我都感到游刃有余。

孔子说“述而不作”，我的工作也不过如此。如果说还有什么发挥，凡有发挥不当之处，当由我个人负责。

还应当说的是：一九八五年秋，我完成了《古代天文历法说解》一稿，王气中先生专门为这题序。十年过去了，气老亦已作古。今将气老的文字移于卷首，以示我的深切怀念。

张闻玉

一九九五年五月廿五日
于贵州大学宿舍 22 栋

王气中先生序

古代天文历法是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中伟大的发现和创造。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是古代文明的标志。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天文历法的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的祖先被称为“全世界最坚毅、最精确的天文观测者。”远在四五千年以前，我国历史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初期，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观测天象，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转和气候的变化以及草木的荣枯和鸟兽的生灭，创制了历法。在现存的古代典籍中保存下来的关于古代天文历法的文献资料，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我国古代，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分工，天文历法的管理和编订很早就设有专职人员。到了阶级社会，这些专职管理天文历法的人员逐渐成为统治者的附庸和臣仆，所谓“文史星历”，不得不听从最高统治者的指挥命令，因此观象授时成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改正朔，颁布历法，成为权力的象征。加以古人对于自然现象的观察和理解都还不够精明，在很长的时间内古代天文历法蒙受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往往和封建迷信纠缠在一起。后之学者在传注古代典籍的时候，因

为受到这种影响和局限，不能作出正确的解释。历代相传，以讹传讹，成为阅读古书的障碍。一直到现在，我们虽然已经对于我国古代天文历法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丰富的成果，但由于不能突破前人的束缚，许多重要问题，尤其汉代以前的历法，仍然得不到确切的解答。

已故贵州大学教授张汝舟先生为着读通古书，对于我国典籍中涉及天文历法的部分，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运用深湛的古汉语专业知识和精密的考据方法，结合现代天文科学的成就和地下出土的文物资料，对过去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建立了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科学体系。根据他的体系来解释汉以前的古代典籍，大都能够破除迷障、贯通大义，一扫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研究中的重重雾障，为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研究开拓一个新的局面。

如他认为西周时代并不是用所谓“周正”，而是建丑为正。因此，对于《诗经》中的《豳风·七月》、《大戴记》中的《夏小正》以及《礼记》里面的《月令》等篇都能得到符合实际的解释。如他认为王国维的“月相四分说”是想当然的悟解，并没有科学的根据，批判那班根据王氏“月相四分说”而建立起来的当代古历研究中的种种错误。如他对于日本天文史学者新城新藏定周武王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066年的错误，从多方面给以论证，指斥我国现代一些书刊仍然沿袭新城氏之说的谬误。如他对于刘歆的“三统历”、战国相传的“三正论”、“岁星纪年”、二十八宿分

“四象”，以及古代相传的积年术和占卜法，等等，都据理分析批判，指出它们在古代天文历法研究中的有害影响。所有这些，都是张汝舟先生对于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研究的巨大贡献。

张闻玉同志受业于张汝舟先生，亲承教言，根据师说，发挥他的心得体会，曾经写了《古代天文历法浅释》，先后在南京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两校中文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为硕士研究生作过专题讲演，深受同学们的欢迎。这之前后，闻玉同志就古代天文历法的问题发表了许多见解，或解读古籍，或阐释出土文物，都有理有据，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天文历法是一门专科的学术。我国古代天文历法又有其自己的特殊体系和习惯用语，只有运用我国传统的体系和推步方法才能迎刃而解。张汝舟先生《二母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是一部学术专著文集，虽然力求浅显易懂，但不能同时兼顾古代天文历法基础知识的解说。因此，初学的人或对古代典籍涉猎不多的读者，阅读他的《论丛》仍然感到困难。闻玉同志这诸多论文可以说是张先生《论丛》的衍义。如果由此深入下去，读张汝舟先生的《论丛》就会更容易理解，对于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探索研究，也会取得入门的途径。

王 气 中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目 次

前言

王水中先生序

科学实用 独具特色

——《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评介	(1)
古代天文学在阅读古籍中的作用	(8)
《夏小正》之天文观	(19)
武王伐纣天象之辨析	(35)
观象授时要籍对照表释义	(46)
释“辰”	(55)
曾侯乙墓天文图象研究	(79)
郑玄古天文观探微	(101)
春秋经传“再失闰”释疑	(114)
驳“三正论”	(132)
《屈原生年新考》志疑	(141)
关于屈原的生年月日	(153)

云梦秦简《日书》初探	(165)
云梦秦简《日书》再探	(180)
试论楚历非亥正	(189)
“惟秦八年，岁在涒滩”考释	(207)
元光历谱之研究	(216)
古代历法的置闰	(232)
殷历朔闰中气表	(243)
汉初朔闰表	(283)

科学实用 独具特色

——《二母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评介

古代天文历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古代典籍无不以它为养料丰富自己，众多的天象记录，大量的年月日记载就是最好的明证。而两千多年来对于古天文历法的研究却不能使人满意，这一古老文化在近人眼里已是高深莫测，令人望而却步，无异于玄迷之学了。如何对古代天文历法这一学问正本清源，揭示出它自身的发展规律，推动其他有关学科的深入研究，就是当今古天文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贵州大学张汝舟教授（1899—1982）五十年代就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他凭着广博的学识，深邃的洞察力，立足考证，阐幽发微，给古代天文历法这一学科以正确的解说，独辟蹊径，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他的学说体系的特色是，从文献中来，到文献中去，上下贯通，情理两合，勾画出古代天文历法的原貌，突出了它的科学性、实用性。

由贵州大学张汝舟教授遗著整理组整理的《二母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汇集了张汝舟先生有关的主要论文，最近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国古代合天文、历法为一事，天象校正历术，历术反映天象。追求任何年代的实际天象，便是历术推步的根本目的。如果使用太阳历，问题就十分简单。而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便采用了阴阳合历体制，需要添置闰月以使朔望月长度与回归年长度彼此协调，所以，追求实际天象的主要内容就是推算出月朔及置闰。

时至今日，一般文史工作者对古代天象的推算，或苦于无法，或权依刘歆《三统历》，认为那就是中国最早的历法专著。张汝舟先生是明确否定《三统历》的（见该书 161 页）。其主要依据是，四分术的《三统历》不精，经三百年便有一日之差。依《三统历》章蔀推算，不能得出实际天象。王国维先生据此建立“月相四分”说，便是上了《三统历》的当。王氏“四分一月”自是不可信据的（见 164 页）。

如何推求实际天象，这是张汝舟先生学说最精妙之处。他以为当在四分历的基础上，加上四分术与实际天象的年差分，以创制行用四分历之年为起算点，其法则甚为简易（见 91 页）。

这就牵涉历法的创制与四分历法的含义这两个大问题了。张先生为此写了《“历术甲子篇”浅释》，认为《历术甲子篇》就是古代号称“天正甲寅元”的四分术殷历，它的历年近距在公元前 427 年周考王十四年，《汉书·律历志》是天正甲寅元殷历的天象依据。通过《“历术甲子篇”浅释》，整个四分历推演法可了如指掌。《史记·律历志》这一

读不懂的天书不仅可读，而且于历术推步有莫大的价值。利用《历术甲子篇》给我们的数据，推演实际天象，不仅使人感到亲切，而且准确可靠。历代对于司马迁留下的《史记·历书》的误解与非议，都从此得到澄清，从此得以纠正。

有了中国古代历法创制、行用的具体年代，战国以上的漫长岁月，包括岁星纪年在内，还是观象授时，历不成“法”，年月日的调配尚无规律可言。这样，西周对于月相的重视，春秋经传关于岁星纪年的记载，干支纪年的行用，汉代所谓“古六历”之说，都可据以得到正确的解释。

利用古代历术可以便捷地推求任何年代的实际天象，这在年代学上当有无可估量的实用价值。两千多年来，历代学人对于实际天象的推求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而终不得其法，抱恨终身者比比是。武王克商的年代，屈原生年月日，以及铜器所记历日，都给文史界带来了没完没了的麻烦，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而今有了这一套简明的推算技术，人人可得而用之，对于若干涉及年代学的学术问题的作用是自不待言的了。

张先生据此，于1957年发表了《再谈屈原的生卒》，1964年又写了《西周考年》，都在于将科学的历术引入应用的领域。只要掌握了实际天象的推算，屈原生于公元前343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年）正月二十一日的结论，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的结论，都会令人心悦诚服。

张先生还据此编制了《西周经朔谱》、《春秋经朔谱》。

两谱是对两周文献，尤其是春秋经传深入研究的成果，又是对文史工作者研究两周文史梦寐以求的极好工具。对春秋经传年月日的理解，通过《春秋经朔谱》就可以明白无误，西周金文历日，《尚书》、《逸周书》等古籍中的历日记载，都可以在《西周经朔谱》中找到明确的答案。两谱对于朔闰的编排，都立足于实际天象，只要我们掌握了实际天象的推算，人人皆可验证，绝无盲从、迷惑之感。通过实际天象的推演，张汝舟先生的历术观，其科学性、实用性，都会深入人心，产生意想不到的奇效。

张汝舟先生对《汉书·次度》给以高度评价。他看出《次度》所列，冬至点在牵牛初度，认定那就是四分历的天象依据，并将它与《历术甲子篇》有关冬至月朔的数据联系起来，进一步利用岁差与节气更动考出《次度》所列是战国初期的天象，历法的创制与行用必在其时。这与现代天文学给我们的结论，或结合“殷历二十蔀首表”验证，都吻合不误。《次度》与《历术甲子篇》交相辉映，历术与天象相依相存，得到完美的证实。被人遗忘或淹没了两千余年的《历术甲子篇》与《次度》的价值，重新受到了应有的重视。

不仅如此，《次度》所列十二月，完全用了岁星纪年的“十二次”名目。张先生就此发现，用于纪年的十二次，今用以纪月，说明了“岁星纪年”的昙花一现，对“十二次”解说，当有纪年、纪月的不同。进一步发现，中国古代关于二十八宿与十二次、十二辰的配合关系图表就大成

问题。二十八宿的纪月与十二次的纪年，虽然都能在黄道带的星空得到反映，但毕竟风马牛不相及。而历代古天文图表还是利用十二等分黄道带把两者联系起来，代代沿袭至今。张先生有感于此，写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表解》，指出传统的“表一”的错误在于“二十八宿配四象”，造成宿位的颠倒，以及岁星纪年的纪年与十二次的纪月混为一谈，已不能反映四分历的天象（见19页）。

张先生否定“四象”的观点，通过1978年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一件漆箱盖上的天文图象得到证实。盖面一端绘有青龙，一端绘有白虎，二者头尾方向彼此相反，内圈列有二十八宿名目：这个图象上龙虎“头尾方向彼此相反”最能说明问题。按照二十八宿配四象之说，“东方龙，西方虎，皆南首而北尾；南方鸟，北方龟，皆西首而东尾”（孔颖达《尚书疏》）。龙虎头尾方向相同，是四象之说，那是汉代人的附会。“四象”是应该否定的，出土实物提供了铁证。

不仅如此，张先生自制《表二》，纠正历代天文说的错误（见14页）。历代天文图表，在表示十二次与二十八宿关系时总是按“四象”的东南西北方位配上二十八宿，黄道圈内有两个方向相反的十二支顺次，反映“太岁左行，岁星右行”之说。《表二》（见9页）纠正了历代就二十八宿配四象所造成的错误，恢复了二十八宿宿位排列的本来面目，调整了十二宫次的位置。这样一来，二十八宿的运行与二十四节气的配合取得了一致，《汉书·律历》的记载得

到了如实反映：冬至点在牛初，春分点在娄四度，夏至点在井三十一度，秋分点在角十度，历历分明。——四分历与天象的紧密配合，在《表二》上得到了体现。《表二》取消了假岁星（太岁）的安排，明确了木星运行方向，十二支与纪月的“星纪、玄枵、娵訾……”相配合，彻底改变了对“岁星纪年”的认识。昙花一现的“岁星纪年”不过是四分历法产生之前观象授时阶段的一支插曲而已。关于“岁星纪年”的具体推算，该书216页有《“岁星值年”与干支纪年对照表》，可加深我们对“岁星纪年”的正确理解。

《表三》（见10页）更将古代观象授时要籍《尧典》、《夏小正》、《诗·七月》、《月令》所列天象物候进行对照，得出结论：“西周承用殷历，一直到春秋初期。‘三正论’的‘周正’建子，萌芽于春秋中期，末期才稳定；春秋以前，没有周历。”（见25页）《诗经》的用历可以明确，《七月》诗的物候自可得到合理的解说。

《表三》揭示，西周一代行丑正，非子正，这在金文历日研究中有重要意义。前人囿于“三正说”，考校西周历日，总是将正月固死在冬至之月（子月），尽管有实际天象可供比照，而仍得不出令人满意的结论，金文历日的史料至今仍被淹没着，铜器断代的研究便难于取得突破性成就。

《表三》所列要籍的用历和星象，可借以辨识经传，对传文之误说也可得到澄清。涉及《夏小正》者，可对照阅读《夏小正校释》（见103—157页）。那实在是当今难得的古籍整理专著，岂止是校释古天文要籍。

不难看出，张汝舟先生此书已为我们绘制了独具特色的古天文学体系的概貌，对涉及古代天文历法中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给以正确解说，简要明晰，结论可靠。同时，又引入各个应用领域，更令人看到这一学说的实用价值。所以我们说，该书的意义绝不限于古代天文历法这一学科本身，必将推动其他有关学科的深入研究，在学术界产生深远的影响。